



傳統中國政治長期 維持大一統的原因

作者：夏玉泉

2021年9月2日

目錄

1. 前言.....	1
2. 中國與西方政治不同之處.....	1
3. 科學理論解釋大一統的原因.....	2
4. 政治及文化思想對大一統的影響.....	3
4.1 中華民族及國家觀念自古已植根在國人的意識中.....	4
4.2 戰國諸子百家皆具有國家統一的思想.....	5
4.3 經濟發達強化大一統的動力.....	7
4.4 春秋戰國是郡縣制試驗的時代.....	8
5. 結論.....	9

1. 前言

古代中國曾經採用兩種完全不同的政治體制，一是封建制度；另一是郡縣制度。兩種體制相同之處都是在統一的中央政府下存在，有別於夏朝（2205BC-1765BC）之前由部落擁戴共主時期的氏族社會（3000BC-1766BC）。不同之處是在封建制度下，京畿（首都）以外的區域（地方政府），由中央最高領導人（天子）委派親屬、功臣、或前朝王族人員（諸侯）管理，稱作「分封」，他們在分封之地區內擁有政治、軍事、及法治等權力，是地區內的最高領導人；郡縣制度下首都以外的地方仍然由中央最高領導人（皇帝）委派，但出任地方的人（官員）並沒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最終權力仍由皇帝掌握，地方官員只是皇帝的代理人（Agent）。從這個意義上，封建制是一種「分權」制度，郡縣制是「集權」制度。

2. 中國與西方政治不同之處

中國歷史上，封建制度只曾在周朝（1046BC-256BC）實行，到秦始皇（259BC-210BC）統一天下後，郡縣制取代了封建制，雖 14 年後崩潰，但很快就再次興起了大一統的漢王朝（202BC-220）。郡縣制被以後歷代王朝所繼承，整整延續 2000 餘年。因此有謂中國政治是一個「一統」的政治，雖然中國歷史也並不完全在統一的狀態中，如魏晉南北朝（220-589）及五代十國（907-960），但從中國歷史論，

「一統」是常態，「多統」是變態，而且歷史學者錢穆（1895-1990）說：「中國偶爾在多統政治（分裂）下，始終還有一個要求一統的觀念存在。」

這方面中國跟西方截然不同，公元前五世紀到公元前三世紀，中國及古希臘同時面臨著歷史上內部嚴重戰亂的境況，戰亂中都出現了統一運動，但兩者的情況卻不相同：中國經過 250 多年，最終由秦朝（221BC-207BC）收拾了戰國（475BC-221BC）的混亂殘局，以後歷代都維持長期統一；希臘形成了亞歷山大帝國後，僅 7 年即分裂，其後三大繼承者王國內鬥 100 年，才被羅馬逐一兼併。

再從封建制度以後的歷史看中西方的差異，中國實行封建制度後雖然經歷超過 500 年的分裂與戰亂——春秋戰國時代（770BC-221BC），但如前所述，當秦王嬴政統一天下後，中國便趨於一統；西方在公元五世紀由於北方蠻族入侵導致羅馬帝國滅亡，期後各地為抗拒外敵，紛紛建立軍事勢力，結果形成地方分治的封建制度，這局面持續了 1000 年，直到公元 1500 年，期間曾希望憑仗宗教勢力來來組織一個「神聖羅馬帝國」的統一政府，始終仍告失敗，最後還是由西方現代國家如英、法、德、意的興起才結束了封建制度，但仍然處於分裂的模式。

3. 科學理論解釋大一統的原因

歷來對中國政治長期能夠維持大一統的原因，歷史學者的解釋都不一而足，最科學化的解釋是黃仁宇（1918-2000），他對中國特有的地理及氣候因素，來解釋中國需要一個大一統的政府。首先他指出中國北方土壤纖細，黃河中游由北至南將黃土地區割成兩半，在內地接受幾條支流的匯入，其結果是黃河的流水中夾帶著大量的泥沙，所以黃河經常有河床淤塞，引起堤防潰決泛濫，造成大量生命與財產損失的可能。

其次中國地區的降雨受兩項因素所影響，一是由菲律賓海循西北方向吹來的季候風，另一是於由新疆方向自西至東的旋風，當兩種因素結合才能將溫度降低，使其中水分凝結為雨。如果這兩種氣流不斷的在某一地區上空碰頭，當地可能雷雨為災，而且有洪水之患。反之，假使它們一再的避開另一地區，當地又必乾旱。如果有一個中央集權，又有威望動員所有的資源，也能指揮有關的人眾的政府，才可在黃河經常決堤的威脅及水、旱災肆虐之下，給予百姓應有的安全（黃仁宇，《中國大歷史》）。

4. 政治及文化思想對大一統的影響

然而上述解釋只能說明大一統的中央集權政府對中國的迫切性，始終未能解釋中國何以能夠長期出現大一統的政府？又或者說為

何中國的政治觀一統是常態?這裡對有利於中國政治大一統的條件加以分析。

4.1 中華民族及國家觀念自古已植根在國人的意識中

首先比較中西方歷史的不同。西方最輝煌的時代是古希臘及羅馬，希臘是一個很小的半島，在這半島上，有許多分裂的城市，沒有一個希臘國，也沒有一個統一希臘的中央政府；羅馬是一個「帝國」，是一個向外征服的國家，國內有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分，羅馬是征服者，她之外有意大利、希臘、及地中海的其他被征服地。因此說古希臘及羅馬在一統形態下還有「多統」的本質。中國則不然，她並非帝國，沒有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區分，同樣是中國人，都在同一政府下受著平等待遇。中國在夏、商、周（2070BC-256BC）以迄現在，仍是一條線的「中國人之中國」，而且中國人都有一個共同的任務，就是要發揚人類最高的文化，表現人類最高的道德，故中國人國家的觀念，是一種「道德的」、「文化的」、而達到「天下的」國家（錢穆，《中國歷史精神•中國歷史上的政治》）。由此可見，中國人對「大一統」的觀念自古以來已根深蒂固。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境內有著分佈於不同地域的民族，包括：夏、姜、狄、夷、蠻五個氏族集團，本應對中國大一統政治發展有深遠影響，然而到了新石器時代的晚期，中土部分地區因有洪水泛

濫之變，其中不少氏族集團不得不將其地域遷移到其他氏族集團去，所以歷史上有「徙眾居民，乃定萬國」的記載，這樣透過不同氏族的文化混和，各集團互相混合。由混合演進為由各個部落擁戴共主的一種新組織，由新組織產生新意識，繼而再有新組織，得以維繫這種混合的中央政府。「中夏」、「華夏」、「諸夏」、「區夏」等名號及意識的由來，也是「中華民族」自覺意識的由來。中國之所以成為民族的統一國家就是肇端於此，時間約在公元前 2237 年左右(羅香林，《中國民族史•中華民族的成長》)。

4.2 戰國諸子百家皆具有國家統一的思想

如上文所述，封建制是分權制度，地方管治權乃獨立於中央；郡縣制是集權制度，中央權力直達於地方。從西周封建到秦之郡縣，代表中國政體由分權轉向集權的過程，對完成政治大一統有推動作用。在這過程中，出現了一個過度期，即春秋戰國時期，期間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變化，對中國順利走進中央集權制度，確立 2000 多年大一統道路是有它的影響力。

春秋戰國是一個混亂時代，戰爭是該時代的特點。但春秋與戰國的戰爭目的不同：春秋時期諸侯間戰爭的目的是要制止更嚴重的戰亂；戰國時期戰爭的目是攻城略地。因此戰國每場戰爭所耗用之軍力、戰爭工具、及傷亡人數都較春秋時為巨。春秋末年最大的晉、楚兩國，

兵力不過 4 至 10 萬左右；而戰國七雄中，秦、楚、齊、趙各有百萬大軍以上，韓、魏、燕的兵力也不下 60 萬。春秋時期所用的全是銅制兵器、而且純以車戰，故只適宜於平原作戰；戰國所用的兵器以鐵或鋼所製造，殺傷力較大、騎兵及步卒在戰國的戰爭中經常出現，因此作戰之地已不限於平原，山險之地也是戰爭之所、春秋時期戰爭的結果只是捕撈俘虜，奪取財物；戰國時各國對士兵多以首級論功，每次戰爭動輒斬首 10 萬、8 萬，甚至 20 萬，更甚者有一坑 40 萬（張蔭麟，《中國史綱上古篇》）。

戰國時列國之間兼併如此厲害，諸侯們為了確保在國際上的競爭力，難免會對人才需求若渴；由於此時很多貴族在戰亂中淪為平民，他們為了生活，將知識傳播作為謀生之技，打破了封建時期貴族只能壟斷知識的常態。平民獲得知識，為求在列國謀取一官半職，加上一些有志改變當時混亂時局的知識份子的推動，各種學說應運而生，「百家爭鳴」令當時學術界發展到極致境界。

無巧不成話，戰國諸子百家學說中，都有討論大一統的政治理念。梁襄王（生年不詳-296BC）曾問孟子（372BC-289BC）：「天下惡乎定？」（天下要怎樣才能安定？），孟子回答：「定於一」（天下一統便能安定）。孟子更談到統一天下的方法。除儒家外，法家強調「車同軌，書同文」的權力法律秩序、墨家強調「尚同」與「執一」

的社會層級秩序、極端強調自由的道家也如此，老子（571BC-471BC）的「小國寡民」之上還有「天下」與「天下王」；庄子（369BC-286BC）也強調「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他們的宗旨就是建立「統一」秩序，不獨政治統一，社會一切包括度量衡、車軌寬度及文字等的統一。這思想深刻地印於各諸侯的心中，成為秦始皇日後統一天下之根據。

4.3 經濟發達強化大一統的動力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工商事業已經相當發達，據《史記》記載，當時商人的名字及所經營的行業包括：猗頓以鹽業致富、郭縱冶鐵成業、烏氏經營畜牧、巴寡婦清專營礦業。隨著工商業的興盛，大城市亦相繼發展起來，普遍出現於諸侯國的都邑。如齊國的臨淄、燕國的薊、趙國的邯鄲及秦國的咸陽都是重要的工商業城市。最早提出將商業活動為國策的諸侯是桓公（生年不詳-643BC）主政下的齊國，所以齊國的經濟在各國中獨領風騷。商業活躍導致齊國都城臨淄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規模城市，居民人數多達 30 萬（吳曉波，《歷代經濟變革得失》）。

經濟發達伴隨而來的是人口增加，戰國中期主要國家的人口估計如下：秦國得到了巴蜀，隴西，河西等郡，人口達到 300 萬左右；齊國約 350 萬；楚國約 500 萬；趙國平均 250 萬；魏國丟失了河西上郡等地，人口縮減到 250 萬；韓國 175 萬左右；燕國破東胡，開地千

里，人口增至 125 萬；宋國有 125 萬；中山 75 萬；及越國 100 萬。根據當時各國兵力及史料推算，戰國末年（230BC）各諸侯國人口總數約 3,000 至 3,500 萬，經濟史學家麥迪森（A. Maddison, 1926-2010）推算西歐在公元元年人口只有 2470 萬，中國的人口還未到公元已較歐洲多達 40%，可想而知當時各國諸侯所感受到的人口膨脹壓力。人口增加，國土當然需要擴充，在封建制度下全國分成許多大小不一的獨立封國，每個國家的佔地相應較少，若能能夠統一全國，人口的流動自然靈活，農業生產方式及各種制度安排亦可因應全國情況劃一調配，這樣生產量自可增加，人口壓力也可解決，這是戰國時代列國諸侯所期盼的，這結果終被秦始皇所完成。

4.4 春秋戰國是郡縣制試驗的時代

郡縣制並非秦國最早實行，春秋時代的晉國是最早設置郡縣的封國，期後楚國及秦國為加強中央集權，鞏固邊疆防務，亦跟進實施。到秦孝公（381BC-338BC）商鞅變法實施更盛，當時以縣為地方行政單位，對新佔地區設郡，長官為「守」，範圍較縣大，兼有軍事守備性質，其後郡的權責轉以民政為主，下轄若干縣，郡縣制度乃形成。

周之封建是以「禮樂制度」及「宗法制度」來維繫，各諸侯國和周人是合作夥伴的關係，是將這一合伙人制（Partnership）的政治聯盟具體深刻化，用以鞏固周人的統治。當周王室強盛時期，各諸侯

國作為周朝統治基礎承擔起對周王室的種種義務，這讓周朝的疆域一日壯大過一日，統治一日強過一日，但當周王室衰弱，禮崩樂壞，宗法不彰的時候，尤其在周平王（生年不詳-720BC）東遷後，分封制的弊端開始浮現，列國內亂，諸侯兼併，外敵入侵，周天子不但不能駕馭，而且越演越烈，導致春秋戰國 500 年的亂世。韓非子(280BC-233BC) 記下這一混亂局面：「大臣太重，封君太眾，上逼主，下虐民」。西周的滅亡讓秦君看到分封諸侯的問題，所以歷代秦君都在想辦法擺脫這一困局，對分封制不可避免地持有否定態度，這種想法一直持續到秦始皇帝及以後的王朝。漢王朝的劉邦(256BC-195BC) 繼承秦政後，實行封建，大封宗室子弟，不足 10 年，中央對維繫諸侯開始有困難，封建制度在「吳楚七國之亂」（154BC）中消失；西晉開國君主武帝司馬炎(236-290) 也實行分封制，維持了 20 年因「八王之亂」(291-306) 而告終，這些事件都使日後歷朝在位者足以借鑒的。

5. 結論

從歷史發展角度看，中國的政治著重「一統」，西方則重「多統」，中央集權制在中國歷朝歷代延續不斷地實行了 2000 多年，該制度是維繫大一統的有效良方。用中央集權政府能夠妥善解決水災及黃河決堤問題來解釋大一統的原因，不及用政治及文化角度解釋來得有效。中國境內各民族自古都有融合的行動，中華民族是中國的整體

向來在國民心中根深蒂固；戰國是從分治到一統的過度時期，期間諸子百家的學術思想對統一理念的推波助瀾，經濟發達對國土的擴張及政治制度變革的期盼，使大一統能夠在秦朝開始實現。以後歷史發展對分封制弊大於利的實證，是維持中國 2000 多年經常呈現大一統的原因。最近中國分裂超過 70 年，從中國歷史的精神看，統一必會出現，問題只是統一的方式及誰來統一。